

1948年長春戰役—— 以國民黨政府為中心的考察

許浩

摘 要

1948年的長春已成為東北地區國共內戰角力的最前線。長春自是年5月下旬至10月下旬，遭遇共軍的圍困，造成了大量平民「非正常」死亡。既往研究多著力於死亡人數的探討、或是意識形態的爭執，鮮少論及戰爭本身。本文利用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機構所藏相關檔案文獻，結合回憶錄、口述等資料，考察1948年長春戰役期間國民政府及行憲後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概稱國府）決策與因應的得失。

本文認為，長春之所以孤懸東北前線，與國府高層的戰略失誤有莫大關聯。是年5月下旬，大房身機場失陷之前，長春城內早已糧彈不足，而且防務亦存在重大缺陷。遭共軍圍困初期，長春守軍尚能通過有限的空投與城外走私獲得補給；但隨著共軍包圍圈逐日緊密，流向城內的物資日益稀少。國府雖採取了頒布「戰時糧食管制辦法」、發行大額本票、疏散城內人口等措施，以圖掌握城內有限的糧食資源。但因國軍無法從軍事層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終究難以解決補給的根本問題。隨著10月21日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向共軍投降，歷時近半年的長春圍困戰，終以國軍慘敗而告終。

關鍵詞：長春、國共內戰、國民政府、鄭洞國、蔣介石

On the Siege of Changchun in 1948: A Study Centered the on Nationalists' Campaign

Hao Xu *

Abstract

In 1948, Changchun had become the forefront of the Guomind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Northeast China. The siege of Changchun by the Communist army began in late May and ended in October, causing a large number of "unnatural" civilian deaths. Previous studies often focused on the death toll or the ideological disputes, and rarely discussed the campaign itself.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se relevant archival materials at institutions such as Academia Historica in Taipei and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in Nanjing, combined with memoirs and oral histories, to investigate the military decisions and responses made by the Nationalist's Government (i.e.,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Changchun Siege in 1948.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ason Changchun was left alone on the defense line in the Northeas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strategic mistakes made by high-level Guomindang officials. Before the fall of Dafangshen Airport in late May, Changchun had already suffered not only a shortage of food and arms, but also major deficiencies in its defen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ege, the Nationalist army in Changchun still was able to obtain supplies through limited airdrops and smugglings from outside the city, but as the Communist army tightened its encirclement daily, the materials flowing into the city became increasingly scarce. Although the Nationalists, in an attempt to extract the limited food resources in the city, adopted measures such as promulgating wartime food control measures,

*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issuing large promissory notes and evacuating the people from the city, they were unable to make military breakthroughs in the campaign and thus ultimately failed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provision. With the surrender of First Regiment's commander Zheng Dongguo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n October 21, the Changchun campaign that had lasted for nearly half a year ended in the government's disastrous defeat.

Keywords: Changchun, Chinese Civil War, Nationalist Government, Zheng Dongguo, Chiang Kai-shek

1948年長春戰役—— 以國民黨政府為中心的考察*

許浩**

壹、前言

1948年長春戰役是國共東北決戰的前哨戰，且是共軍首次嘗試通過「長圍久困」的手段來奪取大城市。事後中共屢以「兵不血刃，解放長春」而自得，意在說明其未與國軍發生大規模交戰即取得了勝利。然而，長春的「和平解放」並非毫無代價。有論者指出，這套滿是「解放」與「革命」的敘述背後充斥著「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¹除了在長春周邊戰鬥中雙方的傷亡，以及為國軍所殺害的中共地下人員外，最引人注目的是10多萬「非正常」死亡的平民。²

關於在長春戰役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問題，學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據《長春市志·人口志》記載，1947年5月，長春市區人口數為39萬人；1948年上

*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劉維開教授、張力教授、金光耀教授、曲曉範教授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言與指點，涓滴在心，謹此銘謝。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1月30日。

**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¹ 馮客（Frank Dikötter）著，蕭葉譯，《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7。

² 顧萬春、李榮先編，《長春市志·總志》，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89。

半年，則增至61萬1,246人；10月19日長春被中共占領時，人口數僅剩17萬9,241人。³ 根據中共官方統計，長春圍困期間因各種原因，城內流失平民近43萬人。但這43萬人中究竟有多少係「非正常」死亡，眾說紛紜。時任長春市市長的尚傳道認為，「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無辜餓死的群眾達12萬之眾」。⁴ 南京《中央日報》的報導亦與此相類似，長春戰役「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⁵ 另有學者推測「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0至35萬之間。⁶ 對長春平民的死亡人數估算，衍生了學界爭論國共雙方孰該為此負責。

作為戰敗方的國民黨政府側重宣揚共軍對長春的圍困，是造成平民大量死亡的主因，部分親歷者亦持此觀點。⁷ 被俘的尚傳道等前國民政府軍政人員，在事後將此全歸咎於長春守軍實行的所謂「殺民養軍」政策。⁸ 而作為勝利者的中共則聲稱：「由於國民黨推行『殺民養軍』政策，以致路有餓殍，隨處橫屍，倖存者嗷嗷待哺。」⁹ 另自1980年代以來，中共官方即有意識地組織地方史學者，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敘事體系，論證共軍圍困長春的合理性，將戰爭責任完全推給國軍。¹⁰ 這些因素造成既有的論述極易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淖，而不能持中而論。

³ 顧萬春編，《長春市志·人口志》（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8。

⁴ 尚傳道，〈長春困守紀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遼瀋戰役親歷記》編審組編（下略），《遼瀋戰役親歷記》（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頁403。尚氏私下認為約有16萬平民死於飢餓。參見段克文，《戰犯自述》，第1冊（臺北：世界日報社，1978年），頁6。

⁵ 〈鄭洞國壯烈成仁 三百官兵全體殉職〉，《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10月24日，版2。

⁶ 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頁200；遠藤譽，《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臺北：樂果文化事業公司，2014年），頁315。

⁷ 〈長春八十萬人已瀕死亡邊緣 陸續逃出流落瀋陽 瀋各界成立救濟會〉，《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8月14日，版2；遠藤譽，《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頁9。

⁸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政協吉林省長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下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長春：吉林省內部報刊，1985年），頁83。

⁹ 顧萬春、李榮先編，《長春市志·總志》，上冊，頁274。

¹⁰ 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編，《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長春：吉林省內部報刊，1995年）。

其次，相較於當前錦州戰役、遼西會戰研究的濃墨重彩，有關長春戰役的研究似乎顯得蒼白。然而長春圍困戰是國共決戰前夕雙方僵持時間最久的，實可作為觀察國府政略決策與戰略決策的一個絕佳個案，值得重新探究。基於長春圍困戰經歷了國民政府和1948年5月20日行憲後政府的階段，是以本文所稱的國民黨政府，實則包含這二個階段，以下概稱國府。

有關國府在長春戰役前後的決策、因應，學界尚缺乏嚴謹的學術研究，目前僅以親歷者記述¹¹與紀實性著作¹²為主。由於《雪白血紅》、《大江大海1949》等紀實性著作風靡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前的這場大規模圍困戰，一直保持著相當高的熱度。近年來國共雙方有關這場戰役的檔案文獻不斷解密，部分親歷者的口述、回憶亦陸續出版，是這場大規模圍困戰得以重新審視的機緣。至於《長春餓殍戰》、《圍困長春》等著作分別在兩岸出版，將原本學術領域的討論，衍生為兩岸意識形態的對抗與歷史解釋權的爭奪，似已超出歷史研究範疇。¹³

1948年在長春尚未被圍困前，國府為顧及政治聲勢以及爭取美援，一直難以做出棄守的戰略選擇。但固守長春的戰略決策非但不能提高各方對國府的支持，反而凸顯國府負擔不了長春軍民所需的弱點。此戰略不僅導致大量無辜民眾坐困孤城，還使得本就脆弱的戰時經濟瀕臨崩潰。本文利用國史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輔以相關人物的記述與回憶，以國府為中心來回溯這場戰役的爆發、經過與影響，圖以釐清事件脈絡，在此前提下廓清相關爭議，並透視國共決戰時期國府的戰時應對機制。

¹¹ 主要分兩類，第一類為圍困期間長春守軍未寄出的家信。參見張志強、王放編，《1948·長春——未能寄出的家信與照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戚發祥、姜東平編，《兵臨城下的家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二類為戰後中共組織編寫的文史資料。相比較而言，前者較後者參考價值更大。前者能夠較為詳細地揭示長春國軍的心理變化，彌補檔案史料的不足。而後者則較多地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擾，敘述角度較為單一，但卻能提供更充足的信息。

¹² 張正隆，《雪白血紅》（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東冰、孫東，《城圍》（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

¹³ 杜斌，《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1947.11.4-1948.10.19》（臺北：白象文化公司，2017年）；李發鎖，《圍困長春》（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年）。

貳、東北局勢與長春地位的形成

長春作為滿洲國的首都，歷來是東北最為重要的城市之一。抗戰勝利後，國府於1946年1月正式接管長春。其後長春雖曾短暫地為共軍所攻占，但同年5月底便被國軍再次收復。直至1948年10月19日，長春一直都在國府的控制之下。然而，隨著國共在東北勢力的此消彼長，長春已從松花江邊國軍向北進攻的「橋頭堡」，變成了懸於前線的「孤島」。

1947年5月13日，東北共軍發動夏季攻勢，僅在一晝夜間即攻占了長春以西的懷德，消滅了新一軍一個團的兵力。¹⁴ 共軍此番攻勢一度造成長春被圍，蔣介石感到「其勢甚危」。蔣特召見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商討如何處置長春部隊的問題。蔣認為永吉與長春各部隊如果南撤，則可能在途中遭遇不測，若原地固守，反能持久保持。除此之外，蔣還有另一層考慮，「只要瀋陽、長春二地固守不撤，則東北形勢仍可為中央控置也」。¹⁵ 儘管在第三次四平戰役中，七十一軍最終守住了四平，但國軍在東北的處境並未改善。國防部長白崇禧曾勸蔣放棄吉、長，以集中兵力，固守瀋、錦一線，但蔣表示各重要據點「只有苦撐堅持」，「無可再失」。蔣擔心如若中共在長春建立政府，將會對其國際聲望造成巨大打擊。¹⁶

1947年年底，時任東北行轅主任的陳誠判斷東北共軍已達40萬以上，國軍已處明顯劣勢。東北國軍各軍事單位名為52萬7,358人，缺額卻在14萬左右。除此之外，武器損耗亦大，甚需南京撥款增產。¹⁷ 而此時全國戰線均吃緊，美方軍援遲遲未到，國府對陳之所請愛莫能助。反觀此時東北共軍已與蘇聯軍事代表團談妥了軍需物資供給方案，計劃在1948年夏前擴充3萬野戰軍，擴編3個縱隊，並

¹⁴ 劉統，《東北解放戰爭1945-194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385。

¹⁵ 《蔣介石日記》，1947年6月20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¹⁶ 《蔣介石日記》，1947年11月7日。

¹⁷ 「陳誠呈蔣介石」（1947年11月28日），〈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任內軍事資料（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2-00044-006。

由蘇聯裝備若干機械化部隊，擬於春季攻占永吉、長春，夏季奪取整個東北。¹⁸ 1948年年初，新五軍在公主屯被共軍殲滅，東北國軍鬥志遭到重大打擊，將領「戰志不堅，均有畏縮心理」。¹⁹ 自此，國軍被迫分散於瀋陽、鞍山、四平、本溪、長春、永吉等城市，除瀋陽周邊據點還能形成「面」，其餘都是「孤點」。長此以往，國軍極有可能被共軍以大吃小，各個擊破。²⁰

在此種背景下，陳誠舊疾復發，蔣介石斟酌再三，令衛立煌擔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簡稱剿總）總司令。蔣認為「若不積極出擊，作破釜沉舟之決心，則瀋陽二十萬官兵皆成甕中之鱉」，故希望衛能迅速打通瀋錦線。²¹ 然而，出乎蔣預料的是，衛立煌上任後拒不出戰。無論瀋陽周邊據點情況如何危急，蔣如何催促衛出兵救援，衛總是將主力集中在瀋陽附近不動，並聲稱共軍的目的在於圍城打援。²² 除此之外，由於陸路運輸為共軍所阻斷，東北守軍所需物資僅能空運。當時國軍運輸機數量不足，「縱傾全力空運，運輸量亦極有限」。²³ 蔣深知「大兵團靠空運維持補給，是自取滅亡，只有趕快打出來才是上策」。²⁴ 故1948年2月底蔣密令衛將瀋陽主力撤至錦州，協同錦州部隊，東西夾擊瀋錦間的共軍。其後蔣欲以錦州為核心充實戰力，先迅速完成關內作戰，再「規復整個東北」。²⁵ 然而，衛立煌與瀋陽諸將皆認為目前兵力不足、士氣不振，不能行動。²⁶ 在衛的一

¹⁸ 「陳誠致蔣介石電」（1947年12月4日），〈阻擾接收東北（二）〉，《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400-00003-474。

¹⁹ 《王叔銘日記》，1948年1月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63-01-01-003。

²⁰ 蕭源聖，〈陳誠在東北1947-1948〉（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頁62。陳誠在任期間，即有打通北寧路之舉，但因各方掣肘，並未成功。參見林桶法，〈國共內戰時期陳誠與東北戰場〉，收入周惠民編，《陳誠與現代中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頁90。

²¹ 《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31日，自記上星期反省錄。

²² 杜聿明，〈遼瀋戰役概述〉，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9。

²³ 「陳誠呈蔣介石」（1948年2月21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53。

²⁴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頁476。

²⁵ 「國防部呈蔣介石」（1948年2月22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56。

²⁶ 《王叔銘日記》，1948年2月27日，檔號：063-01-01-003。

再反對下，蔣暫時同意了其先行固守的方案，並計劃將永吉、四平部隊分別撤至長春、錦州。²⁷

根據1948年2月間國防部所擬定的「東北作戰指導腹案」，蔣意僅以兩個團駐守小豐滿發電廠，將永吉主力部隊調往長春，並以青年充實軍隊，以達到在敵後牽制共軍的目的。²⁸ 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亦認為「永吉、長春兩大據點以現有之兵力，以致各自減弱其守力。此兩大城當以長春為首要」，遂建議衛立煌速將六十軍全部調至長春，並破壞小豐滿電廠設備。但衛猶豫良久，始終未下決心。²⁹ 3月上旬，東北共軍紛紛向四平集聚，而四平兵力薄弱。衛甚擔心四平失守後，將導致永吉、長春被各個擊破，遂下定決心將永吉守軍撤往長春。此時，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考慮到長春距離瀋陽主力太遠，建議一併放棄長春，提早將兵力集中於瀋、錦。東北剿總幕僚亦建言，以吉長部隊南下，連同自鐵嶺北上之國軍，解四平之圍，「倘此計畫成功實現，不僅可使長春國軍不致孤懸在北，四平得以確保，且使瀋陽地區防務，亦更臻穩固。」³⁰ 但蔣表示，長春仍應固守，一為放棄長春國際影響太大，二為蔣意圖以長春分擔東北共軍對瀋、錦的壓力。³¹

吉長地區作為東北國軍的前沿陣地，局勢已相當緊張。1947年10月，東北共軍發動攻勢，徹底破壞了長瀋鐵路與吉長鐵路。此時長春城內已有中共地下人員活動，「匪諜」甚至已滲透到長春警備司令部。³² 1948年1月上旬，吉長地區的國軍部隊、重要物資以及軍人眷屬，均先後撤至瀋陽。³³ 除此之外，美國駐長春

²⁷ 《蔣介石日記》，1948年2月28日。

²⁸ 「國防部呈蔣介石」（1948年2月22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56。

²⁹ 《王叔銘日記》，1948年3月3日，檔號：063-01-01-003。

³⁰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第4冊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頁41。

³¹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82-483。

³² 「鄭介民致蔣介石電」（1947年12月1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〇）〉，《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37-141。

³³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秘書處電」（1948年1月15日）、「王鐘致中央銀行秘書處電」（1948年1月21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非常時期撤退復業、行員卸職、請假、捐款、薪俸、教育及文書事項卷〉（以下簡稱〈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

領事館以及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各大金融機構的駐長春機關，亦先後撤出。³⁴ 一時間東北國軍即將放棄吉、長的謠言甚囂塵上。儘管國府對此一再澄清，但收效甚微。長春市內的公教人員、商人均試圖儘快逃離危城，為此鄭洞國不得不下令限制其搶購機票，以免動搖軍心。³⁵

由上可知，蔣介石始終將吉長地區的保持，作為對全國掌控能力的體現。儘管東北共軍的攻勢愈來愈猛，國軍據點逐步收縮，但蔣仍試圖利用吉長國軍作敵後牽制，分擔瀋陽主力的壓力。雖然蔣、衛在瀋陽主力的撤留問題上確有分歧，但對吉長國軍的處置態度卻是一致的。此時，國府之所以將吉長地區的保持看得如此之重要，還在於美國「援華法案」的發布已漸有眉目。在國府的多方交涉下，1947年11月，美國表示，願意向國府提供某種程度的經濟援助。國府將之視為美國政策轉向的積極信號，並授意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在美多方活動。³⁶ 1948年4月，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援華法案」，決定給予國府3.38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與1.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在此關鍵時期，國府自然要對外彰顯其對中國的控制力，以及贏得國共內戰的信心。因此，國府對吉長地區的保持，完全是基於政略的考量，而非戰略考慮。若單純從戰略上來說，此時的吉長地區遠離瀋陽主力，早已失去繼續保持的意義。1948年3月13日，共軍再次占領瀋長間要塞四平，自此長春與瀋陽的陸路聯繫徹底中斷，完全淪為戰略上的孤島。³⁷ 有論者認為，隨著四平失陷，長春國軍南下突圍的可能性亦幾乎喪失了。³⁸

等〉），《中央銀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2-198。

³⁴ 中國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央信託局等金融機構均撤出長春，僅剩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留守。參見「孫有斌致中央銀行電」（1948年2月28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秘書處電」（1948年1月19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³⁵ 「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部為限制官商搶購機票出走的代電」（1948年3月29日），收入長春市檔案館編（下略），《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4年），頁298。

³⁶ 高作楠，〈顧維鈞與1948年美國「援華法案」〉（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頁39。

³⁷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86。

³⁸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第4冊上，頁41。

叁、圍困前長春的防務與糧食情況

1948年3月25日，鄭洞國正式在長春勵志社大禮堂宣誓就職，以第一兵團司令之職兼任吉林省政府主席，統轄長春地區防務。城池得以固守的關鍵有二，一是堅固的城防，二是足夠的存糧。故鄭甫一就任，便提出「加強工事，控制機場，鞏固內部，搜購糧食」的方針，以圖固守待援。長春在滿洲國時期即構築永久性防禦碉堡65座。新一軍進駐後，再建永久工事36座，半永久野戰工事395座，獨立據點6座。³⁹ 鄭在此基礎上，以市中心為核心，層層設防，在市內外構築起多道防線，長春一時號稱「堅冠全國」。⁴⁰ 但據國防部第三組視察官陳瑜報稱，長春防務並不樂觀，首先，長春城防尚有較大疏漏，市區周邊的防衛設施雖稱穩固，但縱深較淺，火力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其次，作為長春守軍與外界聯絡的關鍵：大房身機場、寬城子機場，工事均很差，且在防衛陣地之外，這使得5月間共軍能夠較為順利地切斷長春守軍的空運補給。據陳瑜指出，令人憂心的是守軍士氣低落，各級軍官均無堅守城池的決心。⁴¹

此時，第一兵團以新七軍與六十軍為主力，加上兵團直屬部隊、長春警備司令部部隊、新一軍留守處部隊、青年教導第一團、吉林師管區、聯勤十六兵站支部、駐長空軍部隊，連同地方保安部隊，共10萬餘人。新七軍與六十軍以中山路、中央大街為界，各守西、東兩部。這看似龐大的10萬之眾，除士氣低迷外，亦面臨兵員不足、武器短缺的問題。

新七軍是由原新一軍的主力師新三十八師為基幹，加上由滿洲國部隊改編的暫五十六師與暫六十一師組成，名為三個師，實際兵力僅為2萬400餘人。兩個暫編師的裝備、教育均差，亟需補充、訓練，其戰鬥力尚不如六十軍的一八二師。⁴² 該軍另設有青年教導團與騎兵團，青年教導團原為瀋陽二〇七師的建制

³⁹ 「汪文彥致蔣介石電」（1948年4月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71。

⁴⁰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91、493。

⁴¹ 「陳瑜致蔣介石電」（1948年4月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63。

⁴² 「潘佑強致蔣介石電」（1947年12月30日），「徐介人致蔣介石電」（1948年4月3日），

團，有官兵2,000餘人，但裝備及待遇均劣。騎兵團由長春周遭土匪改編，有官兵7,500餘人、馬7,000餘匹，承擔長春周邊掃蕩工作。⁴³

六十軍軍力較新七軍更為薄弱。六十軍為雲南地方部隊，開入東北後多次遭到共軍打擊，一直未能恢復元氣。其主力一八二師尚稱能戰，約有1萬人，另外兩個暫編師共15,000餘人，戰力較弱。另有一個預備師，約7,000餘人，多為新兵。⁴⁴ 更為嚴峻的是，六十軍在撤退長春途中損失甚大。其撤退過程並非如王叔銘所報「處置迅速，行動機密，頗為成功」，亦與曾澤生所云「沿途之匪被我軍擊潰，斬獲頗多。我軍僅後方大行李及掩護部隊受到損失」相去甚遠。⁴⁵ 永吉撤退準備時間僅3小時，秩序紊亂，行動倉促。軍民死傷，公私損失，均無法統計。吉林省保安旅某團甚至曾搶掠民眾軍眷，截繳友軍槍械。由於撤退倉促，曾澤生部不僅未破壞小豐滿水電站，其所存永吉之糧彈亦未攜帶，士兵被服損失達百分之六十以上。⁴⁶ 暫五十二師與吉林保安旅士兵，持武器者不到十分之四，其餘皆為徒手。⁴⁷ 鄭洞國不得不將原屬於新七軍的一些汽車、大砲劃歸六十軍使用。⁴⁸

這兩支主力軍的關係亦不甚融洽。作為地方部隊的六十軍長期受中央嫡系排斥，六十軍進入東北後，遭到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刻意分割使用。在1946年5月的海城戰役中，六十軍所屬之一八四師投共。之後杜聿明將由交警總隊改編的暫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10、002-080200-00546-071。

⁴³ 「汪文彥致蔣介石電」（1948年4月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71。

⁴⁴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92。

⁴⁵ 「王叔銘致蔣介石電」（1948年3月12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74；「曾澤生致蔣介石電」（1948年3月15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四）〉，《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27-058。

⁴⁶ 「陳瑜致蔣介石電」（1948年4月1日）、「徐介人致蔣介石電」（1948年4月3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63、002-080200-00546-071。永吉守軍撤退前，糧彈已極為不足。參見《王叔銘日記》，1948年2月3日，檔號：063-01-01-003。

⁴⁷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8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92。

⁴⁸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94。

五十二師劃歸曾部，意在監視。⁴⁹ 共軍特意運用潘朔端等原六十軍降將，拉攏其下級幹部及士兵，這進一步離間了六十軍與中央軍的關係。保密局一度向蔣介石進言，待戰況好轉，即須將六十軍、九十三軍等滇系部隊調防關內，以免為共軍所煽動。⁵⁰ 蔣深悉雙方隔閡頗深，特叮囑鄭洞國「對於曾軍官兵多應加以優先，使匪方反動挑離之技不能生效也」，並望新七軍軍長李鴻與曾部「共安危，事事應以先友後我」。⁵¹ 鄭亦主動拉攏曾，保薦其兼任第一兵團副司令，⁵² 但兩軍始終貌合神離。王叔銘認為「鄭洞國指揮兩個軍，不甚得力，土匪不攻長春而已，如一開始圍攻則長春危險。」⁵³

針對軍隊缺額問題，首先，鄭洞國將新一軍留長的2,000名武裝官兵補編入新七軍，以圖增加戰力，其次，收編長春郊區部隊。儘管鄭向蔣介石誇稱這些部隊「如有武器，足刻編成一個軍」；⁵⁴ 但實際上除被編為騎兵團的「紅鬍子（土匪）」稍有戰力外，其餘均屬散兵游勇。針對彈械不足的問題，鄭曾向國防部催撥增編部隊所需的裝備，但兵工署遲至6月底才核准撥發。⁵⁵ 此時將械彈空運長春已頗困難，正如戰地視察官李克廷等所言，長春守軍有人無槍，中央「必須空運輕重武器」，李甚至向東北剿總探詢是否有抽借瀋陽武器來長的可能。⁵⁶ 鄭除了再三央求蔣、衛加緊空運外，只能徵用新一軍、新六軍等留存長春的裝備。⁵⁷

⁴⁹ 陳嘉驥，《東北變色記》（臺北：漢威出版社，2000年），頁141。

⁵⁰ 「保密局呈蔣介石」（1948年1月11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15。

⁵¹ 「蔣介石致鄭洞國函」（1948年4月15日）、「蔣介石致李鴻函」（1948年4月15日），〈一般資料—手令登錄（四十）〉，《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91-002。

⁵²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96。

⁵³ 《王叔銘日記》，1948年4月22日，檔號：063-01-01-003。

⁵⁴ 「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9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224。

⁵⁵ 「國防部致郭懌代電」（1948年6月7日）、「國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兵工署致鄭洞國電」（1948年6月22日），〈兵工署撥東北保安機構械彈的有關文書〉，《軍政部兵工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七四-1965。

⁵⁶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6月11日），〈武裝叛國（一六一）〉，《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4-161。

⁵⁷ 據報新一軍留有輕重機槍1,000餘挺、步槍2,000餘枝、美式服裝2,000餘套，另有部分通信器材等；新六軍留有較多彈藥；營城子煤礦公司留有步槍200餘枝、輕機槍13挺、衝鋒槍11枝；嫩江省政府留有步槍200餘枝；長春兵站存有小型無線電機約40餘部。參見「李

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戎馬半生的鄭洞國對此深有體認，只有保證糧食的充足，才能儘可能久地固守長春。從軍糧來說，鄭將自九台南部至公主嶺北部進入長春的運糧車全部截留，以最低價格強行收購。⁵⁸ 截至5月23日，守軍共購屯軍糧約300萬斤。與此同時，尚傳道亦從中央信託局長春分局購得100萬斤大豆，並通知各單位自行購儲糧食。⁵⁹ 此外，長駐長春的新七軍亦有不少存糧。新七軍三十八師和暫五十六師所儲存的私糧，以每人每天1.5斤糧食計算，能勉強支持兩個半月。⁶⁰ 至於六十軍，由於匆忙從永吉撤退，初到長春時，依靠新七軍撥出一部分糧秣才得勉強度日，其糧食儲備極為有限。⁶¹

其次，民糧問題。當時長春城內民間糧食情況大致為：豆餅100車皮，裕昌源火磨廠存有糠粳，酒廠存有糟麴，以及周邊縣鄉平民逃入長春時所攜帶的糧食。這些糧食能供他們以半糠半菜的半飽狀態，維持至7月底。⁶² 然而1947年長春糧食大豐收，何以到了1948年平民儲存糧食竟如此困難呢？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1947年冬天因燃料不足，很多平民將大豆等作物充當燃料，這直接導致在第二年「無糧可存」。⁶³ 第二，民眾並未意識到「長圍久困」即將到來。城內平民事先並未料及圍困會持續如此之久，故未提前存夠糧食。⁶⁴ 部分原本住在城外的中小地主出於對中共土改政策的畏懼，拖家帶口進入城內避難。⁶⁵ 截至1948年

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8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6-092；「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9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229。

⁵⁸ 姚鳳翔，〈新編第七軍放下武器前後〉，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381。

⁵⁹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73-74。

⁶⁰ 張正平，〈戰鬥的富源長制米廠〉，收入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下略），《黨在長春的地下鬥爭（1945-1948）》（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1年），頁236。

⁶¹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500。

⁶² 張正平，〈戰鬥的富源長制米廠〉，收入《黨在長春的地下鬥爭（1945-1948）》，頁235。

⁶³ 吉天順，〈我從長春來〉，《大公報》，天津，1948年9月28日，版5。1947年長春的酷寒情況參見曲曉範，《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47-349。

⁶⁴ 張金泉、張淑琴口述（長春：勝利公園），許浩、羅大川訪問，羅大川整理，2013年7月11日。

⁶⁵ 姚啟明口述（長春：姚啟明住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6月9日。

1月就有近10萬民眾湧入長春。⁶⁶ 這也間接證明一般民眾對即將到來的半年圍困並無太多知覺，更遑論大量存糧了。第三，共軍在長春市郊執行「堅壁清野」的政策，與國軍爭奪耕地。1948年春，中共曾派部隊剷除長春市郊百里內的作物，破壞重要橋樑，並以砲擊掩護小股部隊運糧。⁶⁷ 中共長春工作委員會提出口號「防匪春耕，誰種誰收」，動員其治下民眾積極種地，還組織了地方民兵來保證春耕任務的完成。⁶⁸ 總之，正如尚傳道所統計，在沒有糧食補給的情況下，僅靠圍城前的存糧，城內軍民頂多撐到7月底。⁶⁹

肆、大房身機場失守後長春物資補給艱難

3月四平失陷後，長春守軍的補給主要來自空運，因此位於長春西郊的大房身、寬城子兩機場攸關10萬守軍的存亡。大房身機場作為長春周遭唯一能供較大型運輸機起落的機場，顯得更為重要。該機場原由暫六十一師擔任警衛，鄭洞國特加派暫五十六師主力進駐機場。⁷⁰ 1948年4月上旬，長春周邊的共軍向市內逐步進逼，以第十二縱隊協同七個獨立師的兵力與長春守軍對峙。⁷¹ 5月21日，鄭預估共軍極有可能先打長春，故準備搶占先機。鄭以主力部隊向西北方向掃蕩，試圖以此徹底解除共軍對機場的威脅，同時亦打算藉機搜購糧食。⁷² 事與願違的是，共軍趁國軍主力外出掃蕩，以大批部隊圍攻長春，並以兩個師以上的兵力猛攻大房身機場，機場駐守部隊僅經半夜戰鬥即被消滅。與此同時，共軍亦向小合

⁶⁶ 「韋錫九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1月28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⁶⁷ 「衛立煌致蔣介石電」（1948年6月11日），〈武裝叛國（一六一）〉，《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4-272。

⁶⁸ 張誠華，〈回憶長春工委工作隊的戰鬥歷程〉，收入《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徵編小組編（下略），《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1948.1-1948.10）》（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1年），頁183。

⁶⁹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500。

⁷⁰ 邵炳麟，〈大房身機場失守記〉，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下略），《新七軍投誠》（長春：長春市政协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頁295。

⁷¹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第4冊上，頁40。

⁷²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498。

隆、拉拉屯等地發動猛攻，國軍略加抵抗即於寬城子機場撤守。⁷³ 此時共軍大有「窺取長春之模樣」，⁷⁴ 故鄭急令主力回防長春。國防部亦清楚機場的保持對於長春守軍至為重要，故令鄭「從速反攻」，「於日內收復大房身、寬城子等機場」。⁷⁵ 鄭屢作收復機場之努力，但並未成功。共軍在此役中大獲全勝，國軍損失約4個團的兵力，⁷⁶ 暫五十六師與暫六十一師損失慘重，戰後兩師合計，不足一師兵力。⁷⁷ 自此，長春守軍喪失了周邊機場，與瀋、錦間的空中交通基本斷絕。

5月28、29日，鄭洞國曾兩度致電蔣介石，強調長春守軍戰力薄弱且裝備缺乏，短期內難以恢復機場，催促其派機空投。⁷⁸ 蔣遂令衛立煌、王叔銘「務須盡空軍之全力」對長春加緊空運糧彈。⁷⁹ 東北剿總擬定了空投長春糧彈的計畫，但可用的飛機數量太少。⁸⁰ 在大房身、寬城子兩機場均無法用以空運的情況下，王叔銘強調「如民糧亦賴空運，實不可能」。至於長春城內的臨時機場，「迄今僅修成六百米跑道一條，四周障礙仍未清除，只技術優良之飛行員能勉強降落C47機，而C46機絕不能使用。」⁸¹ 5月底，運輸機在長春守軍的砲火協助與戰鬥機的掩護下，尚能在城內臨時機場勉強降落。⁸² 但隨著共軍的包圍圈日益嚴密，臨時

⁷³ 「衛立煌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8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174。

⁷⁴ 「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4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062。

⁷⁵ 「國防部第三廳工作日記」（1948年5月28日），〈國防部第三廳工作日記（三十七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7-159-6015.7。

⁷⁶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下略），《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767。

⁷⁷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6月10日），〈武裝叛國（一六一）〉，《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4-181。

⁷⁸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28、29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166、002-090300-00183-191。

⁷⁹ 「蔣介石致衛立煌、王叔銘電」（1948年5月29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92。

⁸⁰ 「衛立煌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30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231。

⁸¹ 「王叔銘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30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230。

⁸²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5月31日），〈武裝叛國（一六〇）〉，《蔣

機場已在其砲擊範圍內，較難供運輸機起落。⁸³ 東北剿總對長春守軍的物資接濟只能採取空投，然而其效果卻極為有限。

首先，所投物資數量不足。東北剿總雖規定每天來長空投10萬斤糧食，但實際上從6月中旬起，每日僅可保持5到10架次運輸機抵長空投。⁸⁴ 一架大型運輸機最多載重6,000斤，長春10萬守軍，每人每天以1.5斤糧計，一日所需為15萬斤。即在最理想的狀態下，空投的糧食尚不能完全滿足軍需，更遑論意外情況頻出。據統計，自5月31日至8月9日，長春守軍僅收到糧食約145萬斤，不足9日發放之數。⁸⁵ 而王叔銘卻聲稱6、7兩月空投長春總噸位達1,457噸，⁸⁶ 即291.4萬斤。這與空軍的嚴重走私問題有莫大關聯。平瀋地區多位空軍軍官及家屬利用往來的空運機，從事商業活動；6月初在運往錦州的彈藥箱裡甚至發現了石頭。⁸⁷

其次，物資去向不明。大批物資或落到共軍陣地，或被百姓、低階軍官撿取而不上繳。圍困初期國軍以降落傘來進行空投，每個傘下吊裝100斤糧食的麻袋。由於飛機飛得不高（高度在300-500米之間），儘管投得不準，城內守軍尚能收到糧食。圍困中後期，受共軍高射砲的威脅，來長飛機大多盤旋於高空，「所投糧秣、彈藥散落河中及警戒線外者頗多」。⁸⁸ 國軍為避免物資飄落到共軍陣地，遂改傘投為直接空投糧食包。⁸⁹ 為此，常有百姓被砸傷乃至砸死。⁹⁰ 每當

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3-299。

⁸³ 《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頁771、785。另參見「韋錫九致中央銀行秘書處電」（1948年6月2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⁸⁴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81。

⁸⁵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5日），〈糧政（六）〉，《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87000-00006-007。

⁸⁶ 「王叔銘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3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100。

⁸⁷ 《王叔銘日記》，1948年1月6日、5月22日、5月28日、6月8日、6月9日，檔號：063-01-01-003。

⁸⁸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7月29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⁸⁹ 李其穎口述（長春：長春市軍隊離休退休幹部南嶺休養所），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6月16日。

⁹⁰ 劉震坤，〈困守孤城的點滴見聞〉，收入《新七軍投誠》，頁360。

飛機臨長空投，守軍都如臨大敵，警報長鳴，分赴市區搶收物資，唯恐讓百姓搶去。⁹¹ 鄭洞國規定由兵團部統一收集空投物資，統籌分配給各部隊，凡軍民拾得物資者「均須於四小時內送交兵團司令部」。⁹² 儘管鄭一再嚴令，7月底更是下達訓令「倘再發現擅行搶藏不報者（經查獲或被告發時）」，「即予就地槍決」。⁹³ 但實際情況仍極為混亂，不僅城內百姓視訓令為無物，各部隊亦未遵守訓令。每當飛機來長，各部隊便升火燒水，若米包落到附近，便把米搶來，馬上倒進鍋裡。⁹⁴ 圍困後期，守軍所收到的糧食直接存在新七軍倉庫裡，名為以防萬一，實則為新七軍監守自盜。而六十軍將士僅能以有限的粗糧度日，這進一步加深了兩軍間的隔閡。⁹⁵

再者，空投時斷時續，極不穩定（表1）。國軍在6月初尚能保持一定數量的空投，但6月中旬後，情況卻極不穩定，有時連續若干天都無機來長。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第一，共軍高射砲的干擾。鄭洞國曾向蔣介石抱怨：「接連三日俱無機來，今（文〔按：12〕）日臨空飛機又稱為匪砲火所阻，地面塔臺多次改換航線之指示。未予空投，即行折返。如此情形實令人惶恐萬分。」⁹⁶ 此時，共軍在蘇聯的支援下，已經擁有了一支相當強悍的防空砲兵部隊，對來長飛機產生了相當大的嚇阻作用。⁹⁷ 國軍亦試圖對共軍的高射砲陣地採取反制措施。衛立煌曾令鄭：「密遣幹練諜員深入匪後，確偵匪高射砲陣地位置，並將我砲兵推進至第一線隨時實行制壓射擊，密切與空軍協同撲滅匪砲兵以利空投。」⁹⁸ 但據鄭探查，共軍的高射砲陣地為避免被國軍偵察攻擊，常變換陣形或撤至國軍砲火射

⁹¹ 李其穎口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

⁹² 「國民黨吉林省政府為拾得空投物資者均須送交兵團司令部的訓令」（1948年6月4日），收入《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頁312。

⁹³ 「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部為空投軍糧物資搶藏不報者嚴懲的訓令」（1948年7月22日），收入《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頁316。

⁹⁴ 龍國鈞，〈長春解放經過〉，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372。

⁹⁵ 張維鵬、張第東，〈長春起義前後〉，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346。

⁹⁶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13日），〈武裝叛國（一六三）〉，《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6-403。

⁹⁷ 王立偵，〈回首來時路——陳榮齡一生戎馬回顧〉（臺北：上優文化公司，2016年），頁173-174。

⁹⁸ 「衛立煌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9日），〈武裝叛國（一六三）〉，《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6-277。

表1、1948年5月底至8月底飛機空投長春概況

時間	運輸機 (架次)	轟炸機 (架次)	戰鬥機 (架次)	物資 (包)
5月28日	1	-	2	-
5月29日	1	-	2	-
5月30日	2	-	-	-
5月31日	15	-	-	-
6月1日	10	-	-	-
6月2日	16	-	-	1,500
6月3日	13	-	-	-
6月4日	18	-	-	-
6月5日	20	-	-	-
6月6日	10	-	-	-
6月7日	4	-	-	-
6月9日	-	-	1	-
6月16日	10餘	-	2	-
6月17日	6	1	2	360
6月18日	4	1	2	240
6月19日	4	-	-	480
6月21日	5	-	-	-
6月23日	6*	-	-	-
6月25日	5*	-	-	-
7月4日	1	-	4	-
7月12至25日	63	2	2	糧：2,424（共軍拾得183）；衣：1,011（共軍拾得28）
8月1至20日	136	-	18	糧：7,432（共軍拾得109）

說明：* 資料未標明何種飛機；- 指此欄並無資料。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頁771、773、775、779、783、795、796、799、804、806、810、823-824、853、892。

程外。⁹⁹ 7月17日，國防部只能強令王叔銘加強空投頻次。據王報稱，除惡劣天氣外，每日空投可達40噸，但由於共軍高射砲有增無減，空投效果並不理想。¹⁰⁰ 長春「官兵主食仍零星搜購」，「常難一飽」。¹⁰¹

第二，國軍空運能力有限。據國防部統計，長春守軍所需軍糧與寒服的空運費用合計達42萬億元，遠超出1948年下半年度的運費預算。¹⁰² 除空運費用，國府甚難負擔外，飛機與汽油亦十分缺乏。空軍第十、二十大隊共有C46空運機108架，若全部用作長春空投，「僅敷十至十一個月之消耗」；如按6、7月的運量，則15個月後亦將消耗殆盡。¹⁰³ 7月中旬，蔣介石曾授意國防部研究向長春空投民糧。¹⁰⁴ 據鄭洞國報稱，如增加民糧，則每日需糧330噸。而國軍每日最大的空投量為84噸，即便長春守軍能夠恢復機場，每日空運總量亦僅210噸。無論如何，這都無法滿足城內糧食的需求。¹⁰⁵ 即便如此，蔣仍令王叔銘自8月20日起，調足30架空運機專司長春空投，保證每日增加空投量至90噸。¹⁰⁶ 王深感「汽油至為缺乏」，當時錦州所存汽油僅供10日之用。¹⁰⁷ 9月初，因錦榆鐵路被破壞，錦州之汽油難以補給，14日「長春空投不得已停止」。¹⁰⁸ 據尚傳道稱「軍糧空投僅敷軍隊，且一日不投，即無食」；8月間，民糧共投3次，實際僅收到5,786

⁹⁹ 《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頁808。

¹⁰⁰ 「王叔銘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9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七）〉，《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7-321。

¹⁰¹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5日），〈糧政（六）〉，《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87000-00006-007。

¹⁰² 「何應欽呈蔣介石」（1948年8月11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2-030。

¹⁰³ 「王叔銘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3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100。

¹⁰⁴ 「蔣介石致何應欽、顧祝同電」（1948年7月16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九）〉，《蔣檔》，典藏號：002-010400-00039-029。

¹⁰⁵ 「顧祝同呈蔣介石」（1948年8月26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104。

¹⁰⁶ 「蔣介石批示」（1948年8月23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2-048。

¹⁰⁷ 《王叔銘日記》，1948年8月19日，檔號：063-01-01-003；「王叔銘呈蔣介石」（1948年8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2-048。

¹⁰⁸ 《王叔銘日記》，1948年9月13日、9月14日，檔號：063-01-01-003。

斤。¹⁰⁹ 綜上所述，空投補給不過是形同點綴。

大房身機場失陷後，長春物資補給的另一個方式為走私。走私最為嚴重的地方集中在中長路與伊通河沿岸。這些地區地形複雜，又是各圍城部隊的交界部分，往往封鎖不嚴。走私的要道主要有兩條，一是伊長公路及伊通河兩岸，二是范家屯方向。¹¹⁰ 圍城前期，共軍對長春市區的封鎖尚不嚴密，曾一度導致走私氾濫。據圍城部隊報告，百姓常利用夜間共軍警戒空隙，以走河溝、荒地的方式偷運糧食進城，每次達50至60人之多。¹¹¹ 中共在雙陽縣萬寶山區，僅三天內就沒收了2萬多斤走私糧食。¹¹² 長春守軍極為鼓勵走私，某走私分子向城內運糧時，遭到國軍諜報員敲詐，守軍得知後，立即將該諜報員槍斃。¹¹³ 圍困後期，這種走私活動亦被共軍刻意運用，藉以消耗城內軍用物資。據李克廷報稱，「長市米糧早罄，僅有二道河子我主陣地外之市場，從匪區運來米糧、蔬菜、燃料等，向我奸商易購食鹽、藥品、布匹等。」¹¹⁴

共軍為了切實控制流入城內的物資，遂發動群眾，實行對守軍的經濟封鎖。1948年6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林彪等：「你們斷絕敵人從地面取得糧食的來源，是很必要的。」¹¹⁵ 共軍的經濟封鎖政策，意在阻斷糧食、蔬菜、燃料、牛馬，及一切生活物資流入城內的同時，斷絕城內與外界的商業關係，並肅清走私分子。¹¹⁶ 共軍將長春周邊50里以內作為封鎖地帶，挖掘寬深約4公尺的壕溝，以

¹⁰⁹ 「尚傳道致高惜冰函」（1948年9月30日），《國民黨東北行營檔案》，遼寧省檔案館藏，檔號：JE1-2-214。此件檔案由東北師範大學曲曉範教授提供，因係1990年代所抄錄，當時未及記下所屬卷名，而今該檔案已不再提供調閱，故無法查得卷名。

¹¹⁰ 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編，《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頁80。

¹¹¹ 《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頁799、806、811。

¹¹² 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49。

¹¹³ 唐天際，〈圍城中幾個問題〉，收入張贊新、孫淑範編，《長春圍困戰》（長春：吉林省內部報刊，1999年），頁196-197。

¹¹⁴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17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八）〉，《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45-006。

¹¹⁵ 「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同意打長春的第三個方案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1948年6月7日），收入張贊新、孫淑範編，《長春圍困戰》，頁38。

¹¹⁶ 「肖華同志在圍城政工會上關於圍困封鎖長春的政治工作報告提綱」（1948年6月26日），收入張贊新、孫淑範編，《長春圍困戰》，頁184-185。

用來加強據點、運送部隊，並在此範圍內廣泛發動群眾。¹¹⁷ 共軍將圍城部隊與各縣區的武裝、民兵、自衛隊相結合，以正規軍帶動民兵，形成對長春的層層圍困。這種「社會性封鎖大動員」之所以能奏效，自然與中共向來引以為傲的宣傳工作分不開。¹¹⁸ 中共長春縣委發出指示，一旦發現國軍突圍搶糧，即以「三槍為令」，臨區村民兵、區隊、工作隊必須立即出擊，一同消滅敵人。¹¹⁹ 長春周邊形成了以農民、婦女、兒童為主的軍民城鄉聯防網，建立了一系列的檢查哨卡、戒嚴隊，從而在陸路基本完成了對城內的經濟封鎖。¹²⁰ 據7月中旬共軍統計，此間專司經濟封鎖工作的地方武裝和政府工作幹部就有300餘人。9月初，共軍發出了保衛秋收的指示，號召周遭民眾在中旬前，將陣地前沿的莊稼全部收割完畢。¹²¹ 可以說，共軍將「長郊糧食羅掘，造成周匝百餘里之經濟絕緣地帶」。¹²²

伍、長春軍政當局的經濟因應及其影響

鑑於長春城內糧食不足，各種管道的物資補給亦極為有限，百姓對於糧食買賣日益謹慎，城內糧市愈加蕭條。1948年6月上旬，為了保證軍糧收購，尚傳道等擬定了「戰時長春糧食管制暫行辦法草案」，22日「長春市戰時糧食管制辦法」正式實行。¹²³ 該辦法規定：（一）大米（包括稻、粳）、小米（包括穀子）、高粱、高粱米、包米、大豆、小豆、豆餅、麵粉、小麥等十種糧食，「不

¹¹⁷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6月30日），〈武裝叛國（一六三）〉，《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6-046。

¹¹⁸ 王奇生將國民黨定性為「弱勢獨裁政黨」，其「弱勢」具體表現在宣傳組織工作上。與之相反，中共的長處恰在於此。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修訂增補版），作者自序頁1、頁71。

¹¹⁹ 「中共長春縣委關於阻敵外出搶糧的通知」（1948年8月1日），收入《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頁60。

¹²⁰ 于祺元，《長春解放前夜》（長春：中共長春市委宣傳部、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8年），頁138。

¹²¹ 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編，《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頁166、168。

¹²²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5日），〈糧政（六）〉，《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87000-00006-007。

¹²³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頁502。

論為軍糧或民糧，不論為自存或代存，凡散在本市之商店民宅及各公私機關團體學校者，均須予以登記」；（二）每戶按戶籍人口，以每人每月45斤糧食計，准許留足三個月的食用糧；（三）每戶除自留食糧外，應將餘糧的二分之一按市價供政府徵購；另外二分之一准予自由買賣，但必要時政府仍須有徵購權利；（四）對於登記不實或隱匿不報者，不僅要從重懲處，還要將其「私糧」全部沒收，並獎勵告密檢舉者。¹²⁴

「糧食管制辦法」實行初期，確實起到了穩定糧食市場的作用。不少哄抬糧價的官員、商販一經查實，即被懲處。¹²⁵ 守軍也確實從一些富戶手中收購了糧食。¹²⁶ 但像這樣的富戶僅為少數，大多數民眾鮮有能存夠三個月食糧的。¹²⁷ 與此同時，長春守軍在執行餘糧登記過程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暴力行為。以長春市郊的二道河子與宋家窪子為例，守軍並未留給百姓三個月存糧，而是搜走了所有能找到的糧食。¹²⁸ 守軍徵購餘糧時，「每到一家，先叫自動交出餘糧，實際上是進屋翻箱倒櫃，用槍托敲擊地板牆壁，檢查有無夾牆地窖，如發現糧食，哪怕是少量的，也盡數拿走，根本不給錢。」如遇民眾反抗，守軍「動輒打罵腳踢，甚至刺刀槍托相向。」¹²⁹ 圍困前期，這種借「徵購餘糧」之名，行「公開搶糧」之實的行為，尚限於補給欠缺的雜牌部隊。但到了圍困後期，六十軍的一些部隊也參與其中，「一見誰家冒煙，就去搶糧，搞得城中百姓有一點糧食的，也不敢舉炊，怨氣沖天，但敢怒而不敢言」。¹³⁰

長春守軍除了要面對糧食市場的日益緊縮外，還不得不解決各項經費欠缺的問題。因為軍糧配給不足，鄭洞國只能向各部隊發放代金，允其自行購糧。由於物價飛漲，且空投票款甚微，銀行職員不得不「全體動員，工作深夜」，「每日

¹²⁴ 「國民黨長春市政府戰時糧食管制辦法草案」（1948年），收入《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頁324-326。

¹²⁵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80。

¹²⁶ 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52。

¹²⁷ 戚發祥、姜東平編，〈兵臨城下的家書〉，頁200。

¹²⁸ 于祺元口述（長春：于祺元住所），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10月26日。

¹²⁹ 陳運剛，〈孤城末日〉，收入《新七軍投誠》，頁341。

¹³⁰ 尚傳道，〈長春困守紀事〉，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402。

趕制小額本票」。即便如此，仍難滿足軍需。¹³¹ 除軍方外，省市各機關、醫院、高校亦亟需支應各項開銷，以維運轉。圍困期間，長春與外界一度郵路中斷，造成郵電收發延誤。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屢以「事急時迫，請示不及」，擅自向長春各軍政單位墊借款項。截至8月18日，長春分行未經正常手續，已墊借流通券31.4萬億元，其中30餘萬億元未收回。¹³² 8月初中央銀行總部陸續收到遲到的電報，意識到長春金融秩序的混亂，急令東北區行制止長春分行的借款行為，並要求其向長春各軍政單位催還先前墊款。中央銀行總部規定，今後長春各單位的所有支借均需要東北剿總政務委員會的同意。即便遇到緊急情況，亦僅允許鄭洞國在500億元範圍內斟酌借支。¹³³ 但面對物資供應不足的困境，上項規定無異於一紙空文，長春各軍政單位仍在鄭的擔保下借支各項款項，長春分行亦只能照借。¹³⁴

長春地區用款甚巨，而券料不夠，鄭洞國只能命令長春分行印發大額本票。大額本票的最初面額是100萬元，接著遞增為500萬、1,000萬、3,000萬、5,000萬、1億，最後竟發展到幾十億元一張了。¹³⁵ 據中央銀行稱，自1948年5月底至9月初，長春分行共發行84萬餘億元，匯出14萬餘億元。但據李克廷調查，發行量絕不止此數，僅自長春匯出的數額即約30萬億元，滯留長春的本票更是高達100餘萬億元。¹³⁶ 迨至共軍進占長春，長春分行僅本票一項即發行了13種，總額達83萬1,133億元。¹³⁷

¹³¹ 「韋錫九致中央銀行秘書處電」（1948年6月2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³² 「王鐘致中央銀行業務局電」（1948年8月24日），〈中央銀行墊撥第一兵團吉林保安司令部款（東北券）案〉，《中央銀行》，檔號：2-1749。

¹³³ 「中央銀行業務局致中央銀行東北區行電」（1948年8月10日）；「簽呈」（1948年8月11日），〈中央銀行墊撥第一兵團吉林保安司令部款（東北券）案〉，《中央銀行》，檔號：2-1749。

¹³⁴ 「寧嘉風致中央銀行秘書處電」（1948年10月6日），〈中央銀行墊撥第一兵團吉林保安司令部款（東北券）案〉，《中央銀行》，檔號：2-1749。

¹³⁵ 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編，《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頁132。

¹³⁶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27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八）〉，《蔣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545-006。

¹³⁷ 張慶文、曹俊卿、王哲，〈中央銀行本票〉，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編，《長春文史資料》，總24輯（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頁179。

表2、1948年1月至7月長春市內本票發行概況

時間	發行額	累計發行額	發行指數（以1947年末為100）
1月	797,470	3,725,660	127.2
2月	655,000	4,380,660	149.6
3月	1,647,500	6,028,160	205.9
4月	2,050,000	8,078,160	275.8
-5月15日	2,600,040	10,678,200	364.7
5月16日-7月	39,321,800	50,000,000	1707.5

說明：東北地區貨幣單位為東北九省流通券（1元東北流通券=11.5元法幣¹³⁸）。

資料來源：長春市檔案館藏檔案20-1-809號卷，轉引自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09。

根據長春市本票的發行概況（表2），可以發現5月到7月間長春守軍所發行的本票數額是前五個月的5倍左右。在長春居民看來，守軍發行大額本票之目的，在於「哄搶糧食，實際上拿了一堆廢紙把糧食儲存了」。¹³⁹一旦守軍暫停採購軍糧，糧價立馬回落。¹⁴⁰「本票與糧價互為因果」，大額本票的大量發行，直接造成了長春城內糧價「膨脹不已，無法遏止」。¹⁴¹根據市內的物價變動情況（表3），物價在圍困初期儘管有所增長，但在7月中旬前尚能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隨著城內存糧殆盡、城外封鎖日益嚴密以及空投成效式微，有限的走私遠不能滿足城內物資需求。當時社會上流傳民諺「本票、本票，幾千萬元買不到一個燒餅、半根油條；揩屁股不頂用，買手紙也買不到。」¹⁴²不少長春軍政高官利用關內外貨幣差價懸殊，將大量款項匯往關內。當時長春一斤米的價格，匯到關內

¹³⁸ 〈改革幣值早有計量 東北流通券停止發行〉，《大公報》，天津，1948年6月3日，版1。

¹³⁹ 于祺元口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

¹⁴⁰ 張志強、王放編，《1948·長春——未能寄出的家信與照片》，頁219。

¹⁴¹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15日），〈糧政（六）〉，《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87000-00006-007。

¹⁴² 張第東，〈國民黨六十軍之參加內戰及起義〉，收入政協吉林省吉林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吉林市文史資料》，第2輯（吉林：內部發行，1984年），頁154。

可以買到一兩多黃金。¹⁴³ 僅鄭洞國一人就曾向北平運送流通券300億元。¹⁴⁴ 這無疑擾亂了關內金融秩序，間接加速了後來金圓券的崩潰。¹⁴⁵

表3、1948年5月末至8月長春市內主要物價變動概況

單位：萬元／斤

時間	高粱	大米	豬肉
5月20日	0.5	-	-
5月24日	0.4	-	-
5月26日	3.5	5.5	-
5月29日	4.2	4餘	-
5月30日	4.5	4餘	3.7-3.8
5月31日	4.5	6.7-7.5	6.4
6月1日	5餘	6餘	5餘
6月2日	2-3	-	2.8
6月5日	4.8（白）、4.3（紅）	5.5-6	-
6月8日	4餘	6.1-7	-
6月9日	5.2（白）、4.8（紅）	7.5	6.4
6月10日	6	8	8.7
6月11日 （端午）	6	8	8
6月12日	7餘	-	9
6月14日	7.8-9	10餘（無市）	8-9
6月16日	10	-	-
6月18日	8.7餘	8.7餘	-
6月19日	12-13.5	-	12
6月20日	18	21	-
6月22日	-	35	15
6月23日	23-26.1	28.6	-
6月24日	25-28	-	19
6月25日	26.1-30餘	35	26.1
6月26日	34-38	-	-
6月27日	24-31	-	-

¹⁴³ 段克文，《戰犯自述》，第1冊，頁6。

¹⁴⁴ 《王叔銘日記》，1948年8月13日，檔號：063-01-01-003。

¹⁴⁵ 張皓，〈王雲五與國民黨政府金圓券改革〉，《史學月刊》，第3期（2008年3月），頁73。

6月28日	22	26	26
6月29日	-	25	-
6月30日	30	-	60
7月1日	-	-	40
7月2日	-	-	40餘
7月7日	35	-	80
7月8日	-	-	100
7月9日	46	-	130
7月10日	50-55	-	120
7月12日	100	110	-
7月14日	100餘	-	130
7月16日	90-130	110-150	140-170
7月17日	95	110	-
7月19日	90餘-100	-	170-180
7月22日	160	130餘	-
7月23日	160	-	-
7月24日	180	-	350
7月25日	250	-	-
7月26日	350	-	-
7月27日	400-500	600	550
7月31日	365	-	-
8月7日	700-800	-	-
8月11日	730	-	-
8月12日	950	-	-
8月14日	1,000	-	-
8月16日	1,900	-	-
8月17日	2,000	-	-
8月18日	2,100	-	-
8月26日	3,000	-	-
8月31日	2,500	2,800	-

資料來源：張志強、王放編，《1948·長春——未能寄出的家信與照片》，頁120、122、124、212、219、221、222；戚發祥、姜東平編，《兵臨城下的家書》，頁15、20、25、36、39、40、47、51、64、73、81、84、86、89、91、94、96、98、105、111、116、125、126、140、143、145、151、157、159、162、164、175、176、178、181、184、189、195、200、203、207、208、213、216、219、220、222、233、235；〈長春分行關於長春市市場行情的報告〉，轉引自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52-353；「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6月底，長春市內「草葉、樹根幾成民食主品，腐渣米糠已為軍中主食」。¹⁴⁶ 全市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無糧充饑，到7月初饑民又增加了一倍有餘。¹⁴⁷ 7月中旬，在空投日漸不濟的情況下，鄭洞國十分擔心長春難以固守：「今日高粱米每斤已突破流通券百萬大關，野草樹皮亦將罄盡。餓餒載途，各方雖名救濟而實不至」，「長市群情惶惑，對中樞確保長春之決心無形動搖」。¹⁴⁸ 鄭本人亦對局勢持悲觀態度，希望離長返瀋。¹⁴⁹ 7月底，長春城內連草、樹枝都被採摘而盡，無糧平民全家自殺、集體自殺者日有數起，道旁餓死者日有數十。¹⁵⁰ 民眾的口糧已成為最嚴重的問題，「沒糧的人家叫天不應、呼地不靈，一籌莫展、乾等挨餓；略有存糧的人家也提心吊膽，既怕存糧被軍隊沒收充公，又怕長春圍困，手中有限的存糧難於應付下去，心中無底。」¹⁵¹ 尚傳道為安撫城內平民，一度宣稱在研製「長春丹」。據說，只要吃下三丸，即可保多日不餓。¹⁵² 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癡人說夢。

由於守軍實施戰時糧食管制，公開的糧食市場逐漸銷聲匿跡，而地下糧食交換市場卻暗流湧動。「交換市場上看不到成袋子的糧食交易，有的是兩三斤的交換品和三五個窩窩頭的私下販賣。據說，用一個金戒指僅能換到三五個窩窩頭。」¹⁵³ 城內因為缺糧，遂產生了大量棄嬰。鄭洞國曾授意慈善機構前往領養救濟，但因數量太多，實在超過市府的救濟能力，大多數棄嬰因無人照看而死於饑餓。¹⁵⁴ 至9月間，守軍共收容了1,400多名棄嬰，但因營養缺乏，每日有15名左右

¹⁴⁶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6月26日），〈武裝叛國（一六二）〉，《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5-262。

¹⁴⁷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1948年6月30日、7月5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⁴⁸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13日），〈武裝叛國（一六三）〉，《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6-403。

¹⁴⁹ 《王叔銘日記》，1948年8月3日，檔號：063-01-01-003。

¹⁵⁰ 〈饑餓社會群像——長春通訊〉，《吉林日報》，吉林，1948年7月23日，版2；「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13日），〈武裝叛國（一六四）〉，《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87-017。

¹⁵¹ 李其穎口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

¹⁵² 李其穎，《長春舊事》（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會，2005年），頁138-140。

¹⁵³ 李其穎口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

¹⁵⁴ 龍國鈞，〈長春解放經過〉，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372。

死亡。¹⁵⁵ 圍困後期，市內更是出現了王萬富賣人肉的惡性事件。¹⁵⁶ 此刻「人民怨憤紛紛，被逼走逃亡。中央地方各機關紛紛解體，市府全體員工僅賴查封數家燒鍋之酒糟度命，日來中毒斃命者已達數十人」，「長春艱苦已達頂峰」。¹⁵⁷ 共軍也不由發出「更不知今日長春，已成人間何世」的感慨！¹⁵⁸

除了糧食問題外，長春還陷入了燃料危機。9月，城內燃料出現大規模短缺。守軍一度通過挖掘馬路瀝青、拆用民房木材，獲取燃料，但這遭到了市府的制止。鄭洞國命令尚傳道等擬定辦法，准許守軍拆除哨卡周圍的空房以作燃料，但不准任意濫拆，絕對不准砍伐行道樹，不准挖馬路。¹⁵⁹ 一般民眾只能從滿洲國時期遺留下的煤灰中，撿拾煤核來燃燒取暖。晚上，他們常要穿著大衣、戴著皮帽睡覺，「早上起來被頭上就是一層霜」。¹⁶⁰

在此種背景下，蔣介石只能安撫長春守軍，言及一旦瀋陽主力準備就緒，即將北上赴援。蔣向鄭洞國等保證，自8月20日起，空軍將每日向長春空投物資至少60噸，「此後當繼續增加」。¹⁶¹ 與此同時，蔣密令鄭採取以下三項措施，作「持久固守之打算」：一、將長春市內所有民間及公私物資嚴格集中管制，定量分配，嚴禁私人買賣行為。如有違者，予以軍法從事，就地槍決；二、將所有壯丁與青年一律入伍訓練，不許自由散住，如槍械不足則可以二兵共用一槍；三、強迫疏散市內老弱者（詳見下節）。¹⁶² 但如前文所言，國軍的空投雖有所加強，但效用甚微，空投損失約占二分之一，「每日實達仍不足半日之需」，且於9月初即無法持續。因此，大多數守城部隊仍只能收到代金。¹⁶³ 至於「計口授糧」之

¹⁵⁵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25日），〈武裝叛國（一六八）〉，《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91-009。

¹⁵⁶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80。

¹⁵⁷ 「尚傳道致高惜冰函」（1948年9月30日），檔號：JE1-2-214。

¹⁵⁸ 〈長春糧價飛漲 高粱一粒千金〉，《東北日報》，哈爾濱，1948年8月21日，版1。

¹⁵⁹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81。

¹⁶⁰ 于祺元口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

¹⁶¹ 「蔣介石致鄭洞國、曾澤生、李鴻等電」（1948年8月17日），〈武裝叛國（九）〉，《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032-226。

¹⁶² 「蔣介石致鄭洞國電」（1948年8月17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102。

¹⁶³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27日），〈糧政（六）〉，《國民政府》，典藏號：

舉，意在進一步榨取城內百姓的窖藏存糧。¹⁶⁴ 據長春市府8月24日調查，自22日開始計口授糧，城內糧食也僅能維持到9月末，市內的物價飛漲問題始終未獲根本解決。¹⁶⁵

8月19日以來，長春市糧價已漲至每斤需流通券1,200萬元，黑市糧價更是高達2,500萬元。守軍日需糧款2.1萬餘億元，「數額之巨，早非空運現鈔所能應付」。在糧鈔兩缺之際，本票勢必要繼續發行，每日約需萬餘億元。此時國府已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以圖挽救戰時經濟。22日起，長春分行遵奉總行電令，「項目收支均以金圓券計算，並停發本票」。鄭洞國對此至為憂慮，「目前央行金圓券尚未奉到，又停發本票，所缺軍食何以維持？」若在長春亦推行金圓券，則「新幣又將與物價共成因果，膨脹無已。各地金融必均被波及，至牽動新制根本。」因此，鄭向國府提出三點建議：一、每日須投足實收軍糧20萬斤，這是實行新幣制的前提；二、如能立即運送關內價值60萬金圓券之麥粉約6.8萬袋，或大米300萬斤（包括空投損失在內）交長春分行或省府，用以收回全部本票及流通券，方可能在11月底前實行新幣制；三、如照中央規定，立即實行新幣制，則需金圓券1億元，用以收回已發之本票及券幣。以後軍政及地方所需各種費用，仍需繼續運送。鄭亦知道上述三條，國府無一可保證執行，故提出當下「仍維持舊制，繼續發行本票」。如鄭所料，經財政部、中央銀行研究，金圓券的發行能力斷難負擔長春業已崩潰的經濟，唯有守軍在軍事上取得突破，如收復機場，才能根本解決問題。目下國府僅能救濟長春2,000萬至3,000萬金圓券，以維持軍糧籌購。¹⁶⁶

9月間長春糧價照漲如舊。蔣介石不得不電令衛立煌制止長春分行濫發本票，並限制長、瀋兩市官民利用物價懸殊，向關內匯款牟利。¹⁶⁷ 行政院為解決

001-087000-00006-008。

¹⁶⁴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25日），〈武裝叛國（一六八）〉，《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91-009。

¹⁶⁵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25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103。

¹⁶⁶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26日、8月27日）及兩電批示，〈糧政（六）〉，《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87000-00006-008。

¹⁶⁷ 「蔣介石致衛立煌電」（1948年9月15日），〈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一）〉，《蔣

長春軍糧及本票問題，訂定了「長春短期軍糧票發行辦法」。該辦法規定長春軍糧票在市內代替通貨使用，用以「（一）收兌在長春流通的東北流通券及各種本票，限於11月20日前收兌完畢；（二）就地補償軍糧；（三）支付長春市內文武職人員及士兵薪餉；（四）支付長春市內其他軍政費用。」長春軍糧票以高粱米為本位，面額分為一兩、半斤、一斤、五斤、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等七種。該票將以1:2,000的比例，收兌東北流通券及各種本票，原先本票一律作廢。¹⁶⁸持票人將來可以軍糧票為據，在國軍控制區換取糧食。¹⁶⁹鄭洞國原擬於11月開始實行該項措施，然而10月下旬長春已為共軍所攻占。

重新審視此際的經濟因應對策，可以發現無論是管制糧食，還是發行本票、金圓券抑或是軍糧票，都始終未根本解決長春的物價飛漲問題，甚至助漲了城內物價。6月底李克廷等人即認為，「長春已成孤島，現鈔過多，反為奸匪搗亂金融之工具，擬懇令飭長春中央銀行文武薪給改發行本票」，發行本票原意在「防止貪污兼防現鈔外流」。¹⁷⁰但因無黃金穩定物價，惡性通貨膨脹在所難免。在長春被圍前，尚傳道曾提議國府迅速運來黃金，交長春分行存儲（按五個月經費），以此來負擔軍政費用與收回增發的本票，以圖穩定經濟。¹⁷¹但鑑於長春經濟已呈頹勢，國府既無力也無意執行此項政策。中央銀行亦認為解決長春經濟問題的根源仍在物資供給，否則「無好轉之望」。¹⁷²蔣介石深明此理，故一邊催促守軍收復機場以保證空運，一邊嚴令空軍加大對長春的空投力度，但兩方面均收效甚微。在此情形下，守軍唯有無休止地加印本票，以在最大範圍內榨取城內物資。

檔》，典藏號：002-080200-00426-056。

¹⁶⁸ 「翁文灝呈蔣介石」（1948年9月8日）；「翁文灝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22日），〈糧政（六）〉，《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87000-00006-011。

¹⁶⁹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75。

¹⁷⁰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6月23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八）〉，《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1-002。

¹⁷¹ 尚傳道，〈四進長春〉，收入《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頁74、75。

¹⁷²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8月23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陸、國府的疏散人口政策及其影響

隨著長春各項物資均告不足，國府很快意識到城內60萬平民是個極為沉重的負擔。1948年6月12日，蔣介石電告鄭洞國，長春軍糧補給尚可保證，但無法保證民糧。故蔣令鄭及時向周邊各鄉區疏散民眾，「如共匪不在中途阻止，則准長春民眾南來瀋陽或入關收容，以免人民坐困城內，而使軍糧接濟無虞也。」¹⁷³同日，衛立煌亦電令鄭：「強迫疏散老弱婦孺，控制民糧。」據鄭回報，目前計劃疏散10萬人。¹⁷⁴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守軍是以20萬人為指標來疏散的。6月下旬，守軍以「肅清奸宄，維護治安，減少糧食消耗」為由，疏散市內人口。根據其所頒布的「長春市政府疏散市民辦法」，被強制疏散的平民只准攜帶「十日份乾糧及應用衣物」，一旦出城「不得再次入市」。該辦法還規定：「集中強制疏散時，須於當日晚戒備後，由主辦機關秘密執行，並於翌日三時前押出哨卡，送至指定地點。」¹⁷⁵6月底，被疏散者以乞丐及囚犯為主，亦有部分主動出城赴瀋的公職人員。¹⁷⁶7月底，守軍開始第二次強迫疏散，計劃於七天內疏散約15萬人。¹⁷⁷但疏散成效並不理想，「一月以來，雖設法疏散，終以匪圍重重，成效殊少。」¹⁷⁸此時，出哨卡者大多為即將餓斃之人。¹⁷⁹8月17日，蔣再令鄭強迫疏散城內老弱婦孺。然而，8月間尚有餘力出城者大多為壯丁，城內僅剩下老

¹⁷³ 「蔣介石致鄭洞國電」（1948年6月12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095。

¹⁷⁴ 「衛立煌致蔣介石函」（1948年6月12日），〈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五）〉，《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556-120。

¹⁷⁵ 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69、370。

¹⁷⁶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6月28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⁷⁷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27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八）〉，《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1-052。據尚傳道記述，此次疏散係7月下旬蔣介石所下的命令，但查無所據。尚傳道，〈長春困守紀事〉，收入《遼瀋戰役親歷記》，頁403。

¹⁷⁸ 「鄭洞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31日），〈東北各省市臨時緊急措施（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75700-00007-004。

¹⁷⁹ 「有糧食就不出去了，都是餓得眼看要死了，不走就得餓死了。」參見張金泉、張淑琴口述，許浩、羅大川訪問，羅大川整理。

弱掙扎求生。¹⁸⁰ 為將饑民強制疏散到城外，守軍規定每個軍警必須趕走8個人，每個保長必須攆走3戶人家。不走者，將沒收其全部家產。¹⁸¹

自圍困開始後，長春不斷有難民出城謀生。據共軍方面統計，6月初每日有200至300人經孟家屯外逃。6月底，共軍已意識到國軍在疏散人口。大批民眾在孟家屯、洪熙街等國共交界處向共軍請願，要求放行。¹⁸² 共軍出於戰略考慮，對長春實施嚴格封鎖。對於出逃民眾，共軍雖聲稱「主要陣地不讓其通過，個別的看法處理，緩衝地帶要疏散。」但實際上卻企圖利用飢民來增加「敵社會不安」，「乘機發放傳單，鼓勵饑民搶劫」。¹⁸³ 有資料顯示，共軍曾動員出城難民回長春參與暴動。¹⁸⁴ 共軍在第一線每50米設一哨兵，並加裝鐵絲網，挖掘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¹⁸⁵ 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出城的公務人員尚能以重金賄賂國軍哨卡，重返市內。¹⁸⁶ 一般民眾出城後，只能被阻於國共陣地間的「真空地帶」，進退不得。據悉，6月底已有2萬難民被阻於長春南部的范家屯，¹⁸⁷ 5萬難民被阻於孟家屯，每日有10餘人餓死。¹⁸⁸ 7月間，大批難民自長春出逃。他們所帶的糧食極為有限，大多以黃豆、豆餅為主。為防止被哨卡內土匪搶奪，一些難民只能將僅有的口糧放在推車底層，覆以豆葉掩蓋。¹⁸⁹ 除此之外，出城難民的糧食來源不外乎有二：第一，在哨卡內就地覓食。起初尚有草籽、毛豆、樹皮可供食用，¹⁹⁰ 但到了8、9月已是一

¹⁸⁰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25日），〈武裝叛國（一六八）〉，《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91-009。

¹⁸¹ 岳英，〈在長春西地區所見〉，收入《新七軍投誠》，頁60。

¹⁸² 《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頁775、796、799。

¹⁸³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7月12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⁸⁴ 〈我們要活命！——長春50萬人民的控訴〉，《大公報》，上海，1948年9月30日，版3。

¹⁸⁵ 「東北野戰軍圍困長春報告」（1948年9月9日），收入軍區政治部研究室編，《瀋陽軍區歷史資料選編》（瀋陽：軍區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頁150-151。

¹⁸⁶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電」（1948年6月28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⁸⁷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6月30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⁸⁸ 《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頁812。

¹⁸⁹ 匿名老人口述（長春：南湖公園），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9月15日。

¹⁹⁰ 張金泉、張淑琴口述，許浩、羅大川訪問，羅大川整理。

片荒蕪。第二，搶奪他人食物。後出城者往往會被哨卡內難民搜走所有可供食用的口糧，「甚至都有這樣的人，把東西趕緊吃進嘴去，搶了就往嘴裡吃，還沒等咽下去，別人就從嘴裡給摳出來了。」¹⁹¹ 7月中旬，「真空地帶」除餓死者，尚有近7,000人奄奄待斃。¹⁹² 「野外的小路旁、水溝、空地、大樹下等處，都可以看到倒斃在地的餓殍。」¹⁹³ 部分難民被迫以人肉充饑。¹⁹⁴ 7月底，一些難民冒險偷渡共軍的封鎖線，「惟為共匪槍殺者亦日有所聞」。¹⁹⁵

共軍於8月4日開始分批釋放哨卡內的難民，截至9日，通過洪熙街進入共軍陣地的難民計有2萬人之多。¹⁹⁶ 14日，中共吉林省委成立了以唐天際為首的「處理難民委員會」（簡稱「處委會」），負責處理長春城外的難民問題，同時決定由長春、九台、德惠、伊通、雙陽、永吉等縣接受並安置難民。¹⁹⁷ 但需要注意的是，共軍對難民的所謂「放行」與救濟，並非是毫無條件的。共軍圍城指揮所規定，「一挺輕機槍可帶出七人，步槍可帶出三人，手槍可帶出二人。」¹⁹⁸ 這一點也為國府方面的文獻所證實，「匪為取武器計，外逃難民如能繳槍一枝或子彈若干，即可放行。」這導致長春守軍在哨卡出口處，嚴加查禁槍彈，並辦理登記。¹⁹⁹ 據此推測，最終能夠獲得共軍救濟的人，大多為有途徑獲得槍彈的官兵、有錢人和地主，至於被強制疏散的平民則只能生死由命。

死亡於「真空地帶」的人數已經難以統計了，只能得知此處難民的約數。當

¹⁹¹ 于祺元口述，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

¹⁹²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7月14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⁹³ 彭雲鵬，〈我在兵團部特務團〉，收入《新七軍投誠》，頁354。

¹⁹⁴ 楊治興，〈在鄭洞國將軍身邊〉，收入《新七軍投誠》，頁367-368。

¹⁹⁵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等電」（1948年7月31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¹⁹⁶ 〈圍城簡報〉（第3期），轉引自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78。

¹⁹⁷ 「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處理長春週邊難民的決定」（1948年8月14日），收入《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頁69-70。

¹⁹⁸ 〈圍城簡報〉（第2期），轉引自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76。

¹⁹⁹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致中央銀行總裁電」（1948年7月31日），〈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等〉，《中央銀行》，檔號：2-198。

時「處委會」將興隆山、淨月、長南三地，確定為開放口，並設立了3個難民辦事處（表4）。辦事處先後救濟了超過16萬難民，加上8月4日至9日，共軍於洪熙街救濟的2萬餘名難民，8、9兩月，中共共救濟難民近19萬人。

表4、難民辦事處收容概況

時間	辦事處	難民數（人）
8月12日至9月30日	長南區	68,471
8月13日至9月28日	淨月區	65,000
8月26日至9月28日	興隆山區	31,302
總計	-	164,773

資料來源：〈圍城簡報〉（第4期），轉引自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頁379；張誠華，〈回憶長春工委工作隊的戰鬥歷程〉，收入《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1948.1-1948.10）》，頁186。

除了大量難民出逃外，國軍亦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士兵持械出城。據中共方面記載，7月份僅長南地區即收容出逃國軍584名，其中尉級軍官52名，收繳各類槍械77枝，各種彈藥6,000多發。8月間，逃亡更甚。自8月1日至10日，僅十日內，新七軍就逃亡了11名尉級軍官、32名士官、135名士兵；六十軍則有15名尉級軍官、89名士官、368名士兵出逃。²⁰⁰ 經過數個月的饑餓，除了補給最為充足的新三十八師尚稱意志堅強外，其餘各師的下級官兵均意志動搖，化妝潛逃者多不勝數。²⁰¹ 9月間基層官兵因饑餓而投共的日有數十。每連士兵最多才80名，最少僅5、60名，較6、7兩月，基層士兵已逃亡近半。至於全班攜械投共者，亦時有所聞。9月底，騎兵第一旅一夜就有100多名士兵嘩變。²⁰²

²⁰⁰ 〈困守長春國民黨軍 士氣低落紛紛逃亡〉，《吉林日報》，吉林，1948年8月25日，版2。

²⁰¹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8月8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九）〉，《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2-061。

²⁰² 「李克廷致蔣介石電」（1948年9月25日），〈武裝叛國（一六八）〉，《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91-009。

國府所執行的疏散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為守軍減輕了糧食壓力，但物資匱乏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反而使大量民眾淪為國共間軍事角力的犧牲品。但並非如中共官方論述所一味譴責的那樣，應將民眾的大量死亡歸咎於國府的疏散政策。事實上，對於城內的無糧民眾來說，與其同國軍一起坐以待斃，出哨卡逃亡尚有一線生機。李克廷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哨卡內民眾大量死亡的原因所在，「匪為欲耗盡我存糧，阻滯不進，我為節省糧食，既出不容自動回長。」²⁰³一般民眾在出城前明顯低估了這場戰爭的殘酷。

柒、代結論—國府在政略考量 與戰略制定間的「兩難」

1948年10月初，蔣介石曾幾番電令鄭洞國率部突圍，但終因共軍陣地防守嚴密，難以推進。10月中旬，曾澤生率部投共，21日，鄭洞國正式向共軍投降。長春失陷給國府的統治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一方面，共軍可以進一步整合東北資源，集中兵力，圍攻廖耀湘兵團，及瀋陽、平津地區；另一方面，中共在東北獲得了政治據點，其聲勢進一步提高，而國府之聲望則日益低迷。更為重要的是，歷時半年的長春圍困極大地影響了國軍的士氣與鬥志，平津各據點守軍惶惶不可終日，甚擔心為共軍所困，淪為「長春第二」。²⁰⁴

若單純從戰略角度來講，5月大房身機場的失陷是整場戰役的關鍵。此後，戰局陷入無解，斷絕空運的城內軍民徹底淪為「棄子」。國府雖一再通過空投、發行本票、疏散城內人口等措施，維繫長春這一「孤點」的固守，但終非長久之計。換言之，長春城內的物資補給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這暴露出國府內戰時期經濟體制的脆弱性。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在國共內戰中，美國對國

²⁰³ 「李克廷、蕭樹瑤致蔣介石電」（1948年7月6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八）〉，《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1-025。

²⁰⁴ 「潘華國致蔣介石電」（1948年12月18日），〈武裝叛國（一七二）〉，《蔣檔》，典藏號：002-090300-00195-281。

府的經濟援助具有兩面性。²⁰⁵ 美援雖然能使國府在某種限度內運轉下去，但卻阻礙了國府內部變革的可能，其經濟結構的崩潰很容易被美援掩蓋。激烈的國共內戰無疑加劇了國府的經濟危機，1948年長春戰役很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5月長春徹底被圍後，國府不僅難以徵購足夠的軍糧，亦缺乏充足的運輸能力，只能通過無休止地印發本票，飲鴆止渴。但在美國「援華法案」甫將實施時，蔣介石、衛立煌等國軍高層一度將希望寄託在即將到來的美援上，樂觀地表示，11月再作東北全軍撤往關內的準備。²⁰⁶ 這種對外部援助的高度依賴，不僅使得國軍內部的腐敗、低效等問題愈加惡化，還影響了國府政略的制定。

長春失陷後，國府曾從國軍內部的組織、宣傳等層面，對此次戰敗進行反思與檢討。²⁰⁷ 有論者指出，國軍內部的「雙頭制」指揮體系是造成戰敗的重要因素之一。²⁰⁸ 但縱使上述種種得到解決，當時背景下長春失陷亦是早晚之事。²⁰⁹ 自第三次四平戰役以來，長春的保持已失去了事實上的戰略意義，僅具有政治價值，象徵著國府對東北的所謂控制力。²¹⁰ 戰後國防部反思道，「長春之失，即由於此過去處處設防，兵力分散，犯兵家大忌，即處處無防，為匪所擒（大吃小）」，「故應改正『面子』主義，避免固守一地」。²¹¹ 國府之所以執著於長春的保持，正在於其攸關國府在國內外的聲望，是國府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象徵。像長春這樣的大城市一旦丟棄，必然影響美國對國府的進一步援助。此種政

²⁰⁵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著，陳之宏、陳兼譯，《冷戰與革命——蘇美衝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7。

²⁰⁶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頁113。

²⁰⁷ 「蔣介石致顧祝同等電」（1948年10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十一）〉，《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34-082。

²⁰⁸ 即國防部長作為最高階的軍事機構首長，僅具有名義上的政務許可權；而參謀總長雖位階稍低，卻實際管理國防部絕大多數部門，在軍令範圍內更是直接向國家元首負責，故該體制實質上保證了蔣介石對軍務的裁決權。參見陳佑慎，《國防部：籌建與早期運作（1946-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頁350。

²⁰⁹ 六十軍投共對於長春戰役的結局影響並不大，長春守軍受困日久，城破只是早晚之事。參見楊維真，〈國共內戰時期東北戰場中的滇軍（1946-1948）——以第六十軍為中心的探討〉，《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6期（2001年8月），頁90。

²¹⁰ 〈搜乘補卒話東北（上）〉，《大公報》，天津，1948年5月4日，版5。

²¹¹ 「侯騰呈蔣介石」（1948年11月11日），〈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蔣檔》，典藏號：002-020400-00016-155。

略考量嚴重限制了戰略的制定與實施，以至撤守時機一再錯失，數十萬軍民坐困危城。

因此，國府在1948年長春戰役中的決策與因應，陷入這樣的悖論。一方面，國府出於政略與爭取外援的考慮，難以做出棄守長春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國府無力負擔保持長春所需要的物資、運力成本，而這將向外界進一步暴露國府的統治危機，繼而動搖各方對國府的信心。在政略考量與戰略制定的糾結中，國府進退失據，不僅導致了長春戰役的失敗，更使得城內數十萬無辜民眾慘遭厄運。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作為在野黨的中共則手段靈活，既無需顧及城池丟失所造成的國內外影響，亦鮮少顧及戰爭中的百姓傷亡。因而，在長春戰役中，共軍戰略調整自如，從5月突襲機場、試圖速占長春，到6月「圍而不打」，再到8月初有限度地開放「哨卡」，靈活切換，極大地損耗了國軍本不富足的戰略物資。在此種情勢下，國軍之敗似是注定的了。而歿於該場戰役的十數萬餓殍，在勝利者的歷史書寫中，僅會被稱為「勝利的代價」。

徵引書目

一、檔案

《中央銀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報告市情、非常時期撤退復業、行員卸職、請假、捐款、薪俸、教育及文書事項卷〉。

〈中央銀行墊撥第一兵團吉林保安司令部款（東北券）案〉。

《王叔銘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軍政部兵工署》（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兵工署撥東北保安機構械彈的有關文書〉。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東北各省市臨時緊急措施（二）〉。

〈糧政（六）〉。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國防部第三廳工作日記（三十七年）〉。

《國民黨東北行營檔案》（瀋陽，遼寧省檔案館藏）

「尚傳道致高惜冰函」（檔案已不再提供調閱，無法查得卷名）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五）〉。

〈一般資料—手令登錄（四十）〉。

〈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三十一）〉。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四）〉。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八）〉。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九）〉。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十一）〉。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八）〉。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九）〉。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一一〇）〉。

〈武裝叛國（九）〉。

〈武裝叛國（一六〇）〉。

〈武裝叛國（一六一）〉。

〈武裝叛國（一六二）〉。

〈武裝叛國（一六三）〉。

〈武裝叛國（一六四）〉。

〈武裝叛國（一六八）〉。

〈武裝叛國（一七二）〉。

〈阻擾接收東北（二）〉。

〈革命文獻—戡亂軍事：東北方面（二）〉。

〈領袖指示補編（十七）〉。

〈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九）〉。

《蔣介石日記》（Palo Alto,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二、史料彙編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編，《陣中日記（1946.11-1948.11）》，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長春市檔案館編，《長春檔案文獻（1948年卷）》。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4年。

軍區政治部研究室編，《瀋陽軍區歷史資料選編》。瀋陽：軍區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

張贊新、孫淑範編，《長春圍困戰》。長春：吉林省內部報刊，1999年。

三、地方志

顧萬春編，《長春市志·人口志》。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顧萬春、李榮先編，《長春市志·總志》，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四、口述訪談

于祺元口述（長春：于祺元住所），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10月26日。

李其穎口述（長春：長春市軍隊離休退休幹部南嶺休養所），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6月16日。

姚啟明口述（長春：姚啟明住所），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6月9日。

匿名老人口述（長春：南湖公園），許浩、侯晨訪問，于藝欣整理，2013年9月15日。

張金泉、張淑琴口述（長春：勝利公園），許浩、羅大川訪問，羅大川整理，2013年7月11日。

五、文集、回憶錄、書信集等

《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徵編小組編，《中共長春工委史料專輯（1948.1-1948.10）》。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1年。

中共長春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黨在長春的地下鬥爭（1945—1948）》。長春：吉林省內部資料，1991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遼瀋戰役親歷記》編審組編，《遼瀋戰役親歷記》。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吉林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吉林市文史資料》，第2輯。吉林：內部發行，1984年。

《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編，《長春文史資料》，總24輯。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

《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編，《新七軍投誠》。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

政協吉林省長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長春文史資料》，第8輯。長春：吉林省內部報刊，1985年。

段克文，《戰犯自述》，第1冊。臺北：世界日報社，1978年。

張志強、王放編，《1948長春——未能寄出的家信與照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

戚發祥、姜東平編，《兵臨城下的家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遠藤譽，《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臺北：樂果文化事業公司，2014年。
鄭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

六、報紙

《大公報》，上海、天津，1948年。
《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
《吉林日報》，吉林，1948年。
《東北日報》，哈爾濱，1948年。

七、專著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第4冊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
于祺元，《長春解放前夜》。長春：中共長春市委宣傳部、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8年。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著，陳之宏、陳兼譯，《冷戰與革命——蘇美衝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王立偵，《回首來時路——陳燊齡一生戎馬回顧》。臺北：上優文化公司，2016年。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修訂增補版。
曲曉範，《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李其穎，《長春舊事》。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會，2005年。
李發鎖，《圍困長春》。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年。
杜斌，《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1947.11.4-1948.10.19》。臺北：白象文化公司，2017年。
東冰、孫東，《城圍》。北京：團結出版社，2013年。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7卷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

張正隆，《雪白血紅》。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陳佑慎，《國防部：籌建與早期運作（1946-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陳嘉驥，《東北變色記》。臺北：漢威出版社，2000年。

馮客（Frank Dikötter），蕭葉譯，《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劉統，《東北解放戰爭1945-194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霍燎原、崔國璽，《從淪陷到解放：1931年至1948年的長春》。長春：吉林省內部報刊，1995年。

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

瀋陽軍區《圍困長春》編委會編，《圍困長春——一個特殊類型的戰役》。長春：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年。

八、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林桶法，〈國共內戰時期陳誠與東北戰場〉，收入周惠民編，《陳誠與現代中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年。

高作楠，〈顧維鈞與1948年美國「援華法案」〉。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1年6月。

張皓，〈王雲五與國民黨政府金圓券改革〉，《史學月刊》，第3期（2008年3月）。

楊維真，〈國共內戰時期東北戰場中的滇軍（1946-1948）——以第六十軍為中心的探討〉，《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6期（2001年8月）。

蕭源聖，〈陳誠在東北1947-1948〉。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6月。